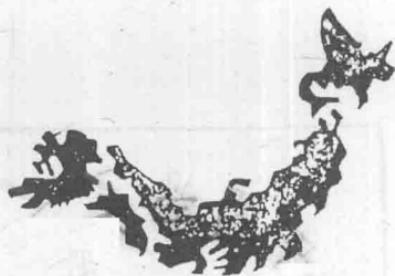


中國與日本

中 国 与 日 本



日本國圖書出版社
總編輯：王雲五
副編輯：張靜、陳定山
美術設計：張靜、陳定山
版式設計：張靜、陳定山
印製：上海華昌印書館
發行：上海華昌印書館

所 版
有 權

著 者 李 凡 夫
發 行 所 上海霞飛路一〇〇號
印 刷 社 引擎出版社
電 話 八三八〇五
定 價 零售每冊三角
出 版 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經 售 全國各大書坊

發刊「中國與世界叢書」緣起

中國不是孤立的中國；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中國了。

世界的現象至為複雜，國際關係至為繁多，世界的任何變化都能影響中國，實無半點疑義；同樣，中國的一舉一動，能夠影響世界，也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我們發行「中國與世界叢書」的目的，無非想把中國與世界重要現象的關係，把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加以扼要的分析與說明，使每個中國人，都能放大眼睛去看，都能真實地了解中國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應該根據那些條件去爭取她的新出路？

中 國 與 世 界 叢 書

(世界和平與中國)

第一種 中國也需要和平嗎

錢俊瑞著

第二種 中國與美國

漢夫著

第三種 中國與英國

錢亦石著

第四種 中國與日本

李凡夫著

第五種 中國與德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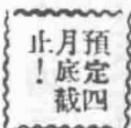
姜解生著

第六種 中國與蘇聯

張仲實著

第七種 中國與弱小民族

吳清友著



零售定價每冊三冊角
預定全套一套壹元陸角

自序

最近論述中日問題的文字已經相當多，就是「真能從國家終極的利害上打算，不爲感情或客氣所驅使，或一時錯誤所蒙蔽的」，也不見得「太少」。但是中日問題仍不失爲當前一個最嚴重，最值得我們加深研究的問題。特別是在目前，在日本人正嚷着「對支那再認識」，在「親善」「提攜」的空氣高張，在綏東的殺氣同樣也很高張，在外表上中日關係好像有

了轉變，而實際上還不知道轉到那裏去的目前，爲要從過去和現在的事實中澈底究明中日關係的動向，爲要把握中日關係的前途和確定我們應走的路線，我們對中日問題，再「作一番忠實的檢討」，仍然非常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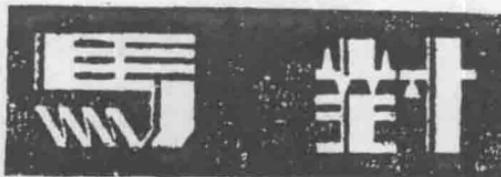
當然，這裏所羅列的也不過是一些平凡的事實和淺見，假如這些平凡的東西，也能引起國人的注意，也能於目前的解放運動有點滴的幫助，那就算意外的收穫了。

最近筆者因小病連綿，精神很壞，以致這小冊不能如期交卷，這是應該向編者和預定的讀者們道歉的。

這小冊如有不妥的地方，誠懇地希望讀者諸君多多指正。

五，十五，一九三七。於上海。

N. 普里波衣著
譯 梅雨



本書是一部最負盛名的歷史小說，描寫一九〇五年日俄大海戰的前因後果，本書作者普里波衣係當時水兵之一，他以文學巨匠的技巧，把他親身經歷的各種事實連續起來，寫成這一部空前的，描寫海戰的文學傑作。一讀此書，我們對於舊俄敗績的原因，以及當時的社會制度等都能洞悉無遺。在提倡國文學的現在，這是一部必讀的傑作。

蘇聯文學批評家羅森達爾曾說：「對馬——這是一部讀下去不肯放手的書，文筆美麗，題材得當，社會內容深刻，人物描寫逼真——所有這些使諸維可夫，普里波衣這兩小說深入羣衆」。（見新二卷三期「譯文」克夫先生後記）。

對馬已是一部世界名著，英法日等國都有譯本，本書在蘇聯出版之後，三年來已銷去一百五十萬冊，日譯出版年餘，也已三十一版。本書由梅雨先生參照英日文本譯成中文，有四份之三曾發表在「現世界」上，甚得讀者好評。上部並附有名貴插圖卅餘幅，並載作者所作「我是怎樣寫對馬的」萬言長文冠於篇首，對於讀者，尤有幫助。

定價——平裝 國幣玖角

引擎出版社發行

歐陸秘聞

(原歐洲名講局)

著原塞耿 编潮揚 譯

本書是一部轟動全世界的名著，牠最大的特點，是把在歐洲政治舞台後面的人的活動，赤裸裸的暴露出來。而編譯者，將原著濃厚興趣，用中國話來表現，尤足令人拍案叫絕。全書共二十餘萬言，分作五冊陸續出版。凡留心世界大勢的人，不可不手置一編。

兩個月內全部

第一篇

希特勒與第三帝國

地中海上的對頭

第二篇

人民陣線

第三篇

大鬪爭中的小嘍囉

第四篇

兩個國聯

第五篇

齊出內月八日至旬中月六自

歐洲問題的關鍵在那裏

(再版) 柳乃夫著
一角二分

危機四伏的歐洲

(最新出版) 朱之平著
一角二分

蘇聯和平政策之真諦

六月金則人合譯實價
三角五分

劉羣合譯實價
六角

目 次

自序

一、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 一

(一) 從史的發展上觀察 ······ 一

(二) 從政治上觀察 ······ 二七

(三) 從軍事上觀察 ······ 四三

(四) 從外交上觀察五四

(五) 從經濟上觀察六九

(六) 從文化上觀察八〇

二、中日兩國有暫時親善的可能嗎？九三

三、解決中日問題的關鍵在那裏？一〇五

四、中日關係的前途一一七

一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一) 從史的發展上觀察

中日兩國是不是自古以來就成爲敵人？

中日兩國決不是自古以來就成爲敵人，恰恰相反，中日兩國事實上曾經做過長期的朋友。自日本有史以來，到日本明治維新時爲止，除明末時日本倭寇大舉向中國侵擾以外，兩千多年來的中日關係，都是很和睦的關係。那時候的中國雖比日本強盛幾十倍；但中國從來未曾使日本吃過什麼虧，反之，日本却從中國得到許多好處，日本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的一切文化制度可以說都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先進的封建國家（指中國）和一個後進的封建國家（指日本）的一段因緣，這一段因緣，我們現在沒有追憶的心情和餘暇了。這裏要說的是在日本維新以後，中日兩國由友人變爲敵人的慘史。

中日兩國
由友人變
爲敵人的
關鍵

中國和日本怎樣由友人變爲敵人呢？這不能不說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從中作怪。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已漸漸踏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却在鴉片戰爭後，漸漸踏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這是中國和日本由友人變爲敵人的重要關鍵。這裏有一個大問題，那就是爲什麼日本會踏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中國却變爲半殖民地呢？這個問題，到現在止，還由許多歷史家在探究中，現在只能綜合一些歷史家初步

研究所得的結論簡括地寫在下面：

中國資本主義為什麼不能發達？

先從中國方面說起。話說中國在封建時代，因為有從原
始社會遺留下來而未被奴隸制時代清算的農村公社（日本人
稱為「共同體」，又稱「共產體」）散佈在各地，公社和公社之間，互相
孤立，「老死不相往來」，所以結果，手工業不能發達，交換關係不能盛
行，工業和農業始終無法分家，地租也不能由現物地租順暢地普遍地發展
到貨幣地租；同時，中央集權式的封建專制政府，為了維持牠本身的生
存，對於工業和商業又採取包辦、摧殘甚至取締的政策。加以中國有好幾
個朝代都受外來民族的侵凌與統治，每一次受外來民族的侵凌與統治，經
濟上必受很大的破壞而致後退。這些經濟和政治的原因，使中國封建社

會停滯了二三十年。一直到滿清末年，工廠手工業才漸漸萌芽，可是根基仍然非常薄弱。就在這個時候，西方的資本主義強盜來了。腐朽了的封建社會，一接觸到大英帝國的鴉片烟味和火藥味以後，即速開始崩潰。那些由西方陸續而來的強盜，牠們並不想中國接受牠們的「文明」，依樣葫蘆地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社會來；牠們只想把中國變成牠們的殖民地，好向中國吸取多量的膏血，以肥大自己。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牠們只有和中國的封建勢力勾結，共同向中國老百姓壓搾。可憐得很，那時中國革命的主體——市民層又是那麼沒有根基，他們不能負起應負的任務！他們不能領導起那些飢寒交迫的奴隸，一面打倒外來強盜的壓迫，一面肅清封建勢力，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中國悲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運就是這樣被決

定了。（請參看何幹之著：轉變期的中國）。

日本資本主義又為什麼能發達？

日本的情形則和中國不同。在日本封建社會裏，殘留的公社（原始共同體）的遺跡，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班田制度」的崩潰，早在平安時代（九世紀以後）就漸漸消滅了。到了鎌倉時代（十三世紀以後），封建制度已有了正常的發展，到德川時代（十七——十九世紀）封建制度已到了最後的階段，資本主義的胚胎也開始在這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了。工廠手工業（如輕工業的製酒業、紡織業、磚瓦業和重工業的煤礦業、鐵礦業、兵器業、鑄幣業等）已普遍於各地，工業和農業逐漸分家，商品交換逐漸發達，商業和高利貸資本逐漸橫行，諸侯和武士們對貨幣的需要日益迫切，他們強迫農民由現物地租改為貨幣地租。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同時，被封建諸侯壓搾得不能生存的農民不是起來「騷動」，動搖封建社會的基礎，就是到都市去出賣勞動，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有了這些相當成熟的資本主義前提條件的日本，遇到外來勢力壓迫之後，便立刻揚起「尊王攘夷」的大旗，一面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天下，建立明治新政府，另一面則抵抗着外來的侵略，實現了所謂由上而下的維新運動。並且，日本比中國幸運的地方，是日本的特殊地理環境和當時的國際情勢於日本特別有利。因為日本市場竟畢沒有像中國市場那麼重要，而「日本又在航路的終點（指由西方到遠東）；西洋鬼子侵略中國的目標，是以印度為第一，中國為第二，而日本則是最後的一個」。所以那些先進資本主義強盜管得開發中國市場，也就沒有充分的餘力去干涉日本了。同時，「俄法正為一八

五三年到一八五六年的 Crimea 戰爭所苦，美國又爲一八五六到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戰爭所牽制，所以對日本這小子，只好馬馬虎虎地放過了」。（請參看拙著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中日兩國由
友人變爲敵
人故事的開始

日本自從幸運地踏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後，中日兩國由友人變爲敵人的故事便從此開始了。

日本是有名的先天不足的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牠一出世就感覺到缺乏滋養的補品：凡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東西——原料和市場——日本都非常缺乏；可是「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適爲過剩」——這個大道理，用不着半世紀後某位先生的慷慨勸議，彼邦的維新「志士」早就懂得了。牠懂得這個道理以後，當然就不會把近水樓台的中國放過。本來，任何資本主義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國家，爲了自身的生存，都不會顧到別人的生存的，自然日本也不能例外；不過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有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初期掠奪殖民地的時候，多半採取經濟侵略的方式，而日本却因爲牠本身的特殊條件，牠一開始就帶着猙獰的面孔，用武士道的精神，向「同文同種」的中國開刀了。牠向中國開刀的步驟——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整個中國——是大家熟知的。明治維新後不到四年，日本就開始執行第一期的工作（征服台灣）了。在執行第一期工作之前，以西鄉隆盛爲首的「英勇」的武士們就提議首先執行第二期工作（征服朝鮮）；可是以大久保利通爲首的「進步派」却認爲不合程序，「斷乎反對」。就是爲了「征韓」問題，西鄉派和大久保派居然打

起架來，結果，大久保派獲得勝利，西鄉派被迫下台。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大久保派所以反對西鄉派的「征韓」，決不是他們有愛於朝鮮或中國，而是因為他們估量日本當時的力量還很幼稚，未必能和中國一戰。所以日本自從大久保領導的「進步派」把西鄉所領導的「守舊派」打倒，並進而平定那些「不平之士」的叛亂後，從一八八五年以後的十年間，便拚命準備「征服朝鮮」的工作，因為他們知道要征服朝鮮，非戰敗滿清不可，要戰敗滿清，就非有相當的準備不行（因為當時的大清國在日本人眼中還不失為一個龐大的東西呀）！所以他們十年間的準備，都是以滿清特別是北洋為假想敵。

「倭人十年的準備到底沒有落空，甲午一戰，後起的日本居然把龐

甲午戰爭——中國的所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
中國慘敗的原因

大的中國打得一敗塗地了。中國的所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由於一個在崩潰中的封建國家敵不住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強盜。但如果作比較具體的分析，却可以指出如下的諸原因：

第一，日本侵略中國，處心積慮，對中國作戰有認真的充分的準備；而中國政府却逆來順受，滿不在乎。雖則受過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戰爭教訓的滿清政府，也開始「準備」着，可是那種準備情形，說來真是令人氣憤。他們不但說不上整個國防的建設，就是枝節的準備，也非常糟糕。朝廷的官吏，大都藉「準備」以飽私囊。監察御史安維峻在奏摺中曾說：「中國出使大臣，向以購買船砲爲利藪，前使臣李鳳苞定造濟遠等艦，與洋員金楷理朋比爲奸，侵蝕至百萬上下，濟遠原價三十萬，報銷六十萬」；而

所購的艦，大抵是「或配製不如式，別國所退，或係舊船改造」，這便是當時準備實情的一端。及至中日戰爭迫於眉睫，英人又勸李鴻章添購快船兩艘，却爲清廷所阻，爲的是慈禧太后要慶祝六十大壽，大建頤和園，須要從海軍經費中撥出三千萬元之多，以供建築之用。你看，這樣的準備，來和日本的「勵精圖治」比較，真是「不待交鋒，利鈍已見」呵！

第二，日本以整個的國力對付中國，而中國則只以局部的力量抵抗。

梁啓超撰李鴻章傳說：「當時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實亦近之。不見乎外省大吏，徒自劃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爲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乃至可笑者，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艦。書中謂此艦係屬廣東，此次戰

役，與廣東無涉云。各國聞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彊臣之思想者也」。梁啟超此言雖近於有意替李鴻章辯護，而沒有指出清廷從未動員全國力量的事實；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當時局部抗戰的實情了。

第三，李鴻章以一人獨當軍事外交之衝，假如他真的能負擔得起這個重任，而真的能忠於謀國，還猶可說；可是事實却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對日本的侵略，事前既沒有抗戰的決心，及至戰爭爆發，又不能迅速佈置，作有効的補救，而且還處處坐失時機，甚至有通敵賣國之嫌。當時御史安維峻上奏請殺李鴻章，奏中曾有這樣沈痛的話：「……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賊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有意勒捐之。有言戰者動遭

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都察院御史易順鼎奏中也說：「大約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爲之；稍有知識之人，皆必能見及之。而不謂渥蒙國恩深悉時務之李鴻章竟悍然不顧，冥然罔覺，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縱使這些御史言官是言之過火；但依照當時實在情形來判斷，李鴻章的誤國，實在無可諱言。

第四，在李鴻章一流的「權奸」把持下的滿清政府，不但沒有犧牲的決心，而且也完全失去了自信心，不能採取持久的戰略。本來，當時大聲疾呼，主張對日作持久戰，並且根據事實，明白地指出日人的弱點的頗不乏人；可是滿清政府爲了「息事寧人」，對於那些真正爲國家民族打算的人的意見，不但不肯採納，反而把他們「革職發軍台，以示儆戒」。

有了這些原因，中國的失敗，乃是無可倖免的事，這一嚴重的歷史教訓，太值得我們今日注意了。

甲午戰爭對於兩國前途

戰爭的結果，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對於中國的加速度殖民地化，有着決定的意義。日本在這次戰爭中，得到了意外的收穫。馬關條約的締結，對日本實在太便宜了。依這條約，日本不但奪得了整個的朝鮮，奪得了奉天省南部和台灣澎湖羣島，奪得了二萬萬兩銀子，和奪得了在中國內地遍設工廠等權利，而且還開闢了進一步侵略滿洲和整個中國的道路。日本把所有從中國搶去的錢，大部分都用在擴張軍備和改良工業中，所以，從此日本的財富便有了大量的增加，日本的威風也日益高張了。反觀中國又怎樣呢？中國自甲午戰敗後，滿身瘡痍，不

忍卒睹，滿清政府的醜態既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壓迫也就愈來愈甚了。帝俄日本在東北，德國在華北，英國在華中華南，法國在華南，各自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而美國則要求「門戶開放」。於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命運更加確定了。

日 俄 戰
爭 與 中 國

野心勃勃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既然得到了鼓勵，從此牠奴化中國的工作，當然要更加積極進行了。可是當牠戰敗中國後，馬上就碰到一個很大的難關，那就是帝俄在東三省和牠的競爭。

日本為要戰敗牠的強敵，為要獨佔滿洲，在甲午戰後十年間，又以全力準備對俄作戰；在軍事上，加緊擴充軍需工業，建造軍艦，改革軍制；在外交上，則進行勾結英國。一九〇二年，日英勾結成功；一九〇四年日俄戰

爭便爆發了。在腐敗的沙皇統治下的帝俄，正像在腐敗的滿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一樣，竟然經不起日本的一擊；日本把帝俄戰敗後，立刻代替了帝俄在南滿的統治，奠定了吞併整個東北的基礎。而中國的地位，也就更加一日不如一日了。

由世界大戰到濟南慘案 在日俄戰後不到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當然，日本認為這是侵略中國的空前的大好機會。牠乘着歐美帝國主義者無暇東顧，便任意為所欲為：一方面武裝佔領青島以至山東全境，另一方面更以最野蠻的手段強迫漢奸的袁世凱政府承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暴日的要求，雖得到袁賊的漢奸政府不聲不響地予以全部的承認；但袁賊的政權不久也就為一部分的愛國軍人所推翻。自袁賊失敗後，暴日

對中國侵略，還是有加無已；同時牠開始採取多面的侵略方式：一面扶植中國的軍閥勢力，分化中國的統一，另一面又向段祺瑞政府舉行亡國大借款（西原借款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強迫訂立「中日軍事協定」（一九一八年），企圖藉此完全控制中國經濟和軍事的實權。當時的漢奸政府對日本的侵略，雖表示極度的馴服；但是中國全國民眾從此不能再「鎮靜」了。特別是因為受了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中慘敗的刺激，空前偉大的救亡運動（五四運動）便洶湧澎湃地爆發起來。這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反日反漢奸的猛烈表現。當時由北平學生教授的登高一呼，馬上得到了全國的響應，掀起了空前的巨浪，給親日政權和日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毫無疑義的，五四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是寫下了最光榮的一页。

日本自遭受這一次猛烈的打擊以後，對中國的侵略，在表面上好像緩和了一些，實際上還是毫不放鬆的。特別是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部分地得到了鼓勵之後，牠侵略中國的興趣更加濃厚了。在中國革命的高潮中，日本是躲在英帝國主義的背後，幹着扒手的工作；及至中國革命高潮過去，日本又重行露出牠猙獰的面孔，居然出兵山東，血洗濟南，武裝干涉中國統一，在侵略中國史上，又開了一次最兇殘的血腥記錄。

九一八前夕

日本在中國的勢力

自甲午戰後，到「九一八」前夕止，日本積四十餘年侵略中國的結果，在中國各方面已造成了龐大的勢力。在經濟方面，日本在華的投資總額，一九三一年時已增至十一億三千七百萬美

金，一九二四年還僅有二億二千萬，八年中增加五倍，大有趕上英國之勢（同期英國自六億零八百萬美金增至十二億零二百萬美金）。加以日本對華投資，大部份集中在交通運輸業、輸出入業、製造工業和礦業上，對於控制中國的生產，有着嚴重的意義。至於日貨在中國市場的充斥，尤為驚人。在一九一八前，日本對華輸入總額竟達三億五千七百餘萬日金，若加上日本在中國境內的工業製品，其數當更可觀。同時，中國對日的輸出，在同期中也達三萬萬圓。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對中國侵略的結果，中國經濟對日本的依賴性是到了怎樣可怕的程度了。在政治方面，隨着經濟勢力的伸張，日本支配中國的政治勢力當然也大大地增加。一方面，一部分與日本有密切利害關係的中國人，很容易變成積極的親日分子，這些沒良心的

積極親日分子就叫做漢奸；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受日本掣肘的一部分中國人，即使在良心上不甘心附敵，但因為要顧忌自己的財產事業，很容易忘記了整個民族的利益，暗中牽制抗日運動，而事實上就是無異幫助日本侵略中國，這些人可以叫做「畏日」分子或「祕密漢奸」。這些公開和祕密的漢奸，在九一八前夕雖尚未形成一種明顯的獨立的勢力，但培養這些勢力的社會基礎已比以前擴大，是無可否認的。日本在中國有了這樣龐大的根深蒂固的勢力，進一步大規模地掠奪中國，顯然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在國際上有利於牠動手的時候，牠就可以動手了。剛好在那時候，震撼全球的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了。恐慌使英美兩帝國主義內部和國際間的矛盾尖銳起來，無法用全力兼顧遠東的利益；恐慌又使日本侵略中國，找求出路

的獸性衝動起來，於是日本大舉掠奪中國的各種條件都已成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由關東軍向瀋陽北大營的進攻，展開了劃期的中日新關係。

五年八個月來

九一八事變發生，我國事前既毫無準備，事後又採取歷史上所沒有的不抵抗政策，瘋狂殘暴的侵略者遂得在短期內毫不費力地完成了牠侵華的第三期（征服滿蒙）工作，並且還迅速推進第四期（征服全中國）的工作。現在把五年八個月來的空前嚴重的國難血史簡述如下：

日本吞併東北，不但是已定的計劃，而且也有充足的準備。因為日本軍閥事前決沒有料到數十萬東北軍竟至毫不抵抗。也許他們在「中蘇戰

爭」（一）中很明白的看穿了東北軍的弱點，日本軍閥就來一股硬勁試試看。真是可憐得很，日本關東軍在九月十八夜發動後，只消一個晚上，便把瀋陽完全佔領；不到三天工夫，遼吉兩省的重要城鎮也完全落在「皇軍」的手中。最可痛心的是後來馬占山將軍在齊齊哈爾雖奮起抗戰，但以孤軍無援，竟遭失敗，使敵人的鐵騎得在我東三省內，如入無人之境。由九一八到錦州失陷，爲時不過三個多月，三百七十六萬七千七百餘萬方里的面積和二千四百多萬人口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竟完全爲敵人佔據了。敵人爲要掩飾世人耳目，爲要便利統治，在佔領東三省後，立刻就把所有甘受利用的漢奸，加官賜祿，成立「滿洲」傀儡政府。因爲「征服滿蒙」的工作，如此容易執行，侵略者的野心更大，所以「一二

八」淞滬戰爭便繼之而起。可是這次却出乎敵人意料之外，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奮勇殺敵，給敵人以從來未受過的打擊，使華中華南的危機緩和不少。然而可歎的是在三十多天無戰不勝的英勇抗戰之後，又是孤軍無援，自動撤兵，而且還屈辱地成立了上海停戰協定，結果，上海附近幾百里土地即變為可以駐屯日軍的非武裝區域，吳淞要塞亦被拆除。得寸進尺的侵略者在淞滬戰後，又以全力侵犯熱河，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完全佔領熱河之後，又長驅進犯長城，假如不是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和中央關黃等師在古北口喜峯口抗戰，大敗日軍，平津一帶恐怕早已割入「滿洲國」的版圖了。可是在這次犧牲之後，又屈辱地成立了塘沽停戰協定，給敵人奠定了「華北特殊化」的基礎。

在塘沽停戰協定簽字（一九三三·五·卅一）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已改為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數管齊下的手段。同時，侵略者為要排斥英美的勢力，竟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發表獨占中國的天羽聲明。不爭氣的中國，至此也在「不得已」的情勢下，由依賴國聯，「長期抵抗」，進而與「友邦」親善提攜了。在中日親善的口號之下，一方面對「滿」通郵、通車，漸次解決；另方面，又將全國反日運動嚴行禁止，甚而連教科書的內容也被迫修訂。但是侵略者却不因此而滿足，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華北日軍又突然提出新要求，結果，成立何梅協定。我國在河北的駐軍被逐至保定西南，連國民黨也不得在河北活動，於是平津事實上又落入敵人的血口中了。

不管我國怎樣退讓，敵人的進攻還是有加無已，一九三五年冬，日本乘意阿戰爭擴大，英國困於對付意大利之際，日本又派遣土肥原在華北導演「自治運動」，企圖使華北五省從中國版圖分開。同時，廣田外相又提出比「二十一條」有過之無不及的三大原則，要求中國根絕抗日運動，承認「滿洲國」和中日共同防共。假如不是全國民衆的紛起反對，假如沒有「一二九」北平學生的大示威和前仆後繼的全國學生的怒吼，則「防共自治政府」的設立，恐怕還不止限於冀東和內蒙古兩地呢。

自從廣田三原則提出以後，中日關係，更加緊張了。到去年底，日本又利用成都北海汕頭漢口和上海等事件，向中國政府提出比三原則更具體更苛刻的七大要求，企圖一口吞併中國。可是中國方面的實情，已再不能

容許接受這些條件，所以川越大使雖曾與張外長作八次的談判，也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在中日談判到了最緊急關頭的時候，綏東抗戰爆發了，「外交談判」便無形中止；雖則在這期間，西安事變發生，侵略者曾費了很大的氣力，企圖挑起中國的內戰，以達到「以華滅華」的毒計；但由於全中國人民的怒吼，終於使這條毒計無法實現，而以外交起家的日本廣田內閣也因「外交失敗」而倒台了。

日本內閣由廣田換到林銑十郎以後，侵華方式，又有了新的改變，關於這，下面當另節詳述。

以上我們雖然只是很概略地檢討了中日兩國由友人變爲敵人的成因和經過。但是我想這已經很夠幫助我們想像：中日兩國在現階段到底能不能

由敵人再變爲友人了。

(二) 從政治上觀察

兩種不正確的對日觀察法

六十餘年來，我們從敵人所受到的賜與，實在是夠慘痛了。可是到今天爲止，似乎還有許多人對於敵人的猙獰面孔，沒有澈底地正確地認識清楚。他們所以不能有正確的認識，有些固然由於無知；但有些也許是有意的。這裏我們最少可以舉出兩種對日本錯誤的觀察方法：

第一，有些人故意（或無意）把日本支配階級間的矛盾誇大起來，他們甚至認爲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只是少數軍閥的意思，而不是日本整個

支配階級的國策，於是他們根據這樣錯誤的幻覺，主張中國可以運用外交策略，促進日本支配階級的矛盾，甚至也有主張中國可以和日本的「穩健派」聯合起來，利用他們去牽制日本軍閥對中國的侵略行動。這樣的主張說來雖覺可笑，但事實上的確有人這樣主張過，到現在止也的確還有人在幻想着，認為這是可行的。前月日本經濟考察團兒王謙次一行到中國來，大受一部分「高等華人」的歡迎，在那些歡迎者當中，就一定有不少人抱着這樣的幻想：我們好好的招待他們，和他們攜起手來，好讓他們吃饱了「支那料理」回到東京之後，更加努力地去牽制日本軍閥對中國露骨的侵略。這樣的思想和行為，和當年袁世凱派日本顧問去疏通日本元老派，請他們去牽制軍閥，可說是異曲同工。

第二，還有一些人和上面看法相反，他們完全否認日本支配階級間的矛盾，他們認為日本軍閥和財閥，急進派和穩健派之間的種種衝突和鬥爭，全是故意演給中國人看的雙簧。

不消說，這兩種觀察方法都是錯誤的，前者可以說是巧妙的降敵的漢奸理論，後者則是不合事實的唯心的看法。

對日本
內部應有的認識

我們必須認識，日本的軍閥、財閥、政黨、元老、重臣、官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者，他們有同一的立場，那就是要維持有利於他們的現行社會制度。為了發展或挽救這種制度，無論急進的軍閥也好，或穩健的財閥也好，他們要採用可以發展或挽救這種制度的一切人爲的方法，如侵略中國，進攻蘇聯，實行法西獨裁等

等，是完全一致的。不過，在這種「一致」下面，他們因為眼前利害的不同，他們對於侵略中國，進攻蘇聯或實施法西獨裁的時期、方法和準備等具體意見，就會有某種程度的差異。這種由支配者本身利害而起的內部對立和鬥爭，常常形成一種非常複雜錯綜的情勢，很容易使那些視力不足的人的眼睛模糊起來。

日本支配

階級的
兩營壘

白：日本支配階級的矛盾，雖然複雜交錯，但大體上却可分為兩大營壘。第一個營壘的構成分子是軍需工業家、地主、中小工業家，都市農村小資產階級、少壯軍人和軍閥上層急進分子。這個營壘可以總稱為急進派。他們的利益在於發動戰爭，和因軍費增加而引起通貨膨脹。因

爲戰爭可以使軍需工業家的生意興隆，膨大他們的利潤；通貨膨脹可以使那些把土地抵押於大銀行的地主和對銀行負債極巨的中小工業家的負擔減輕。少壯軍人因爲多數是出身於破產的農村，而且大抵是小商人，職業軍人和沒落的地主的子弟，他們親身體驗了農村破產的慘狀和受寡頭財閥壓迫而破產的他們父兄的悲哀，所以他們直覺地要求反對財閥、反對資本家和希望從戰爭中找求出路。同時，這些傢伙，大都受了軍國主義教育的毒害，很難正確地認識社會的缺陷，而只是混亂地形成一種特殊的「日本型」的法西斯思想。至於軍閥上層的急進分子，一方面是受地主和軍需工業家的支持，另方面又受少壯軍人由下而上的推動，所以他們就不能不表示特別的急進。這營壘的中心要求是對外強硬，擴大軍備，統制產業，和改革

行政機構。

第二個營壘的構成分子是金融資本家，輸出業者，元老，重臣，官僚，兩大政黨，和軍閥上層的穩健分子。這一營壘普通稱爲穩健派。本來，這些分子不但在原則上不反對戰爭，而且事實上是侵略中國的主動者。但是，金融資本家經過這幾年來事實上的教訓，他們只要想起無底止的軍費要求，有立即引起財政全部崩潰的危險，他們就不能不感到恐怖了。輸出業者從「生意眼」出發，當然也不願一味對外強硬，引起無益的戰爭，使他們的對外傾銷不能暢行無阻。至於元老、重臣、官僚、政黨和軍閥上層的穩健分子，大都是與金融資本家或輸出業者有密切的關係。這一個營壘主要的要求是維持金融寡頭的利益，希望無事平穩地繼續資本收益。

日益增大的過程，而反對過急的進行大規模的戰爭。

急進勢力
的躍進

這兩個營壘的繼續不斷的鬥爭，已有相當長期的歷史及其原因了。鬥爭而至激烈化的，當以「二·二六」事變和在第七屆議會中「軍部與政黨之戰」兩次為最厲害。兩次重大鬥爭的結果，在表面上，急進勢力的鋒芒都好像被抑制下去了；但實際上，急進勢力却是更加堅實地躍進了一步。在「二·二六」事變後，所謂「政治推進力」對政府的支配無疑比前更加強化，所以廣田內閣有「弱體」內閣之稱；在「軍部與政黨之戰」結束後，「政治推進力」又比前更進一步，所以林內閣甚至有人稱之為「軍部內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我們應該分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由財閥所代表的穩健派，對由軍閥所代表的急進派原無

惡意，不過，當他們利益受到急進派的威脅時，他們當然要動員所有力量起來反對；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對急進派故意爲難到底的意思，只要有可商量的地方都無不願意商量，換句話說，只要軍閥不取唯我獨尊的態度，而願意和資本家妥協的話，他們就可以伸出手來，笑嘻嘻地與軍閥攜手，來實現「軍」「資」共存共榮的實績。在「二·二六」事變後如此，在廣田內閣倒台後，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軍閥所代表的急進派，也因幾年來事實的教訓，他們（特別是他們現在的首腦部）已漸漸知道徒然虛張聲勢的表面上的強硬是有害無益的，沒有財閥支持的「革新」是行不通的，超出了軍需工業生產能力的軍費開支，或不適合於全生產機構的軍需工業的急激膨脹，也是極富於危險性的，於是首腦部便舉全力以一肅軍一一把舊式

的派閥和過「左」的分子除去）。果然，經過「肅軍」後的「全軍總意」，不但沒有像過去那麼「囂張」，而且已漸漸趨向於堅實的前進了。這種傾向是再適合於金融資本家的胃口沒有了。因為兩方面（軍閥和財閥亦即急進派和穩健派）都有妥協的傾向，所以在廣田內閣崩壞後，更正確的說，在宇垣組閣流產林組閣又發生困難之後，經過了有力者的拉線（據說由平沼負責），財閥與軍閥便苟合起來，實現了他們的宿願。結城的加入林內閣，池田的出任日本銀行總裁，和軍部在經濟領域內對財閥的讓步（修改馬場財政），就是這次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應該佔重要的一頁的財閥和軍閥苟合的具體表現。他們苟合成功後，當前的急務是以堅實的步武，向着漸進的法西斯的道路前進。關於這，我還可以作較具體的說明：

財閥和軍
閥妥協
以後怎樣

本來，在軍閥和財閥的妥協沒有成功以前，軍閥要以自己的力量去統制產業，統制資本，這種「倒行逆施」，當然是財閥所反對的；但是，在他們妥協成功之後，情形就不同，獨佔金融資本家對「自治的統制」就樂於接受了。實行「自治的統制」，向着「準戰時體制」前進，這便是「軍」「資」苟合後的第一要着。為要配合這種新情勢，調劑兩方面意見的新的政治評議機關（御用新黨）就有產生的必要。

因為軍閥和財閥（特別是後者）都不便做政治的主體，而必須有政治的代言人。但是，這種任務，政民兩大既成政黨，都不便負擔起來，因為既成政黨的分子太不齊一了，而且牠們又已成為軍部攻擊的目標。這樣，新黨的組織，便成為財閥和軍閥的共同要求。要產生新黨，必須毀壞既成政

黨，或使既成政黨變質，要達到這個目的，有兩種辦法可以採用：第一是連續解散議會，直接彈壓既成政黨；第二是收買和操縱既成政黨的游離分子，使既成政黨從內部瓦解。現在林內閣首先採取的是第一種辦法，並且同時也在採取第二種辦法中。當然，在林內閣任內，組織新黨，毀壞既成政黨的工作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這項工作，如能在林內閣任內完成固好，不能，也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換一個內閣，對於執行法西斯化政策，對於軍資的合作和對於新黨運動，都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對這遲早將要到來的林內閣以至繼林內閣的內閣倒台後的對策，恐怕早已在西園寺，不，在軍閥和財閥們的考慮中了。誰都可以想到，繼林內閣而來的，將是比林內閣更加堅實的法西斯化的內閣。執行這職務的，寺內可，板垣可，

或其他類似的人物亦無不可。這種內閣的主要任務，將是由擴張軍備進而為大陸政策的強行。那時候什麼對華「親善」「提攜」的名詞，恐怕又要放在一邊，而重新採取「實彈射擊」的步驟吧！

很顯然的，日本支配階級正以最大的努力來調整他們兩大營壘間的矛盾，鞏固「軍」「資」合作的基礎，企圖以堅固的「舉國一致」的力量來向日本的老百姓和中華民族加緊開刀，雖則這樣的局面前否像他們所想像似地順利地發展下去，那又是另一問題。

這樣局面的到來，我以為有十二分的可能，然而不是必
~~~日本民衆和中國民衆的責任~~~ 然的。使這種可能性不能成為現實性，只有靠日本民衆和中國民衆的努力。日本國內工農大眾，和一切不以搾取為生的勞動者，對於

日本政府的侵略戰爭政策，早已表示極度的不滿了。在最近一次總選舉中，標榜反法西斯的無產派政黨獲得了空前的勝利，社會大眾黨的國會議員，由十八席增加到三十七席；腐敗的政民兩黨，也因為以反對林內閣爲號召，獲得了絕對的勝利；反之，凡是擁護政府的右翼小政黨無不大大的慘敗。我們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工農勞苦大眾反戰反法情緒是如何的高漲了。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最近因物價高漲，生活惡劣而引起的工潮正風起雲湧地爆發起來，彌漫於全日本，這種情勢，無疑會使日本政府的擴軍政策，統制政策，遭受打擊。假如日本全國大眾反戰反法的鬥爭，能夠更有組織更廣泛地發展下去，對於阻止法西斯政策的進行，是會有着決定作用的。至於根本阻止日本政府大陸政策的強行，中國民衆的責任，當然要

比日本國民來得更加重大。只有中國民衆奮起抵抗，並且只有中國民衆和日本民衆聯合起來抵抗，才能早日實現粉碎日本的大陸政策的目的。

一切嚴重的不正確的對日認識，一切幻想和日本支配階級親善的漢奸理論和由這種幻想出發的行動，對於當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都是極有害的，我們必須糾正牠，打擊牠！我們必須指出：我們不能靠「外交策略」去促進日本支配階級的矛盾，解除中國的民族危機；我們只能靠強硬的抵抗去促進前者，解除後者。我們不要幻想可以和日本支配階級中任何一派聯合，我們只能和日本不以搆取爲生而且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民衆聯合。

我國國內的情形如何？

我們不能諱言，我們國內的情形一向是很糟的，比之敵人國內的情形還要糟得多。敵人國內，只有急進派和穩健

派，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對立；而我們國內則有抗日派和親日派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等等的對立，甚至在抗日派中，也有即時抗日和準備抗日的鬥爭。內亂不斷爆發，外侮日益加深，我在小學時代就常常搖頭嘆息地寫着「國將不國」了。這種「國將不國」的情形，不但「長期停滯」着，而且也日益發展着，一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由於國難空前嚴重的刺激，由於全國同胞要求和平統一和抗敵禦侮的迫切，才有漸漸好轉的趨勢。然而這畢竟還是一種趨勢，這種好轉的趨勢在三中全會中雖已鞏固一些，在快要到來的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中，也將有進一步鞏固的可能；但是，目前離團結全國上下，立刻發動抗戰，收回失地，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時機似乎還很遠，這種前途還須要全國同胞不斷地繼續爭

取！

抗敵的  
禦侮的  
障礙

目前抗敵禦侮，收復失地的最大障礙不在於敵人的蠻強，而在於一部分人仍存苟安的幻想，爲掃除這種障礙，我們就得加強全國人民的團結，阻止一切公開和祕密漢奸的活動，打破他們的幻想。

總括起來說，從中日兩國國內政治情勢來看，目前「親善」的可能已經很少了，儘管中日兩國還有人爲這件事繼續活動着。不過，我們爲要鞏固已得的勝利，開展更大的更有希望的前途，我們對於那些「親善」的活動，仍有加緊監視和糾正的必要！

### (三) 從軍事上觀察

替 日

本

打 算

我們並不是故意要算舊賬，但是爲要使現在和未來不要一錯再錯，檢討過去也是很必要的。不健忘的讀者，大概總能記得：大約在兩年半前，日本正加緊侵略華北，中日關係非常緊張的時候，突然有人想用便宜的辦法，打開「中日間的僵局」，發表洋洋萬餘言的文章，在那文章裏，曾就軍事方面替日本周詳的「打算」過：

「我們現在以純客觀的態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國際上無論在戰略、政略上說，正面以外，當然應該算到側面和背面，側背方面，如其有了對敵，這對敵的

兵力如果運用得法，就可以當得過二倍甚至十倍以上的効力，這是世上無論任何政略家或戰略家所了然無疑的。現在日本如欲東與美國啟戰，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與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之可能。但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鄰國，使無能爲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

接着，這位作者還從多方面加以透澈的發揮，希望日本與中國「結成協調關係」，「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這位作者替日本打算固然十分週到；但他是否想到，假如日本真的採取較軟的辦法，希望和中國「結成協調關係」，驅使中國去做進攻蘇聯或美國的先鋒，中國民族前途，還

堪設想嗎？僥倖日本畢竟沒有接受那位先生的意見，然而日本政府看了那篇文章，似乎確也有所「感動」，所以不久之後，「中日經濟提攜」的呼聲便甚囂塵上；又不久，其中包含所謂「共同防共」的廣田三原則也提出了。但是，日本在戰略上，決不簡單地要「消弭側背面的顧慮」，而是要怎樣利用「這處在側背面的鄰國」（中國）的人力物力，以達到牠「征服世界」的目的。為要達到這目的，牠決不採取「一途」，而是「兩途並進」，即一面要與中國「提攜」，一面又要以實力控制中國。廣田的三原則，就是要在一「提攜」的美名下，以實力控制中國的明證。在這三原則中尤以「共同防共」一條，最為巧妙而毒辣。關於這「共同防共」原則本來已有許多人解釋過，但似乎還嫌抽象，這裏不妨再來考察一次：

## 中日軍事協定

說到「共同防共」，我們不能不想起在第一節裏面曾經提到的往事。那時候，東方強盜的機會實在是太好了。一方面，中國有那麼一個北洋軍閥政府，可以聽日本予取予求；他方面，俄國革命剛告成功，基礎尚未鞏固，絕不放過機會的日本帝國主義，便決定大舉出兵西伯利亞，同時強迫中國「共同防敵」。這真是一舉兩得的「美事」：出兵西伯利亞有囊括北滿，外蒙和西伯利亞廣大的領土的希望；在「共同防敵」的圈套中，中國不但要送人去替牠當砲灰，供給軍事資源，而且中國廣大的領土都要被劃入行軍區域，中國的軍權也要無形中落在牠的手中。當時日本方面負責向中國交涉訂結這「軍事協定」的是曠代的侵略魔王田中義一；而中

國方面極力促成這件事成功的是著名的賣國賊駐日公使章宗祥。日本爲要欺騙中國的昏庸政府，曾口口聲聲說「日本對中國實無野心」，「深望中國當局放開胸襟，勿以從前的日本相視，切實共同提攜」。（章宗祥電外交部）。北洋軍閥政府在威迫利誘之下，對日本的要求，便一一答應下來了。結果，訂立了如下的軍事協定：

關於海軍方面主要的條文：

一、中日兩國海軍因敵國勢力之東漸，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歐戰之義務起見，取共同防敵之行動。

二、中日兩國當局，屆基於本協定開始行動之時，對於各自本國艦船及官

民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當命令或訓告，使彼此推誠親善，同心協力，以達共同防敵之目的。

三、中日海軍當局，在協同作戰期間，為圖協同動作之便利起見，應行左記事項：

- a. 關於直接作戰上軍事機關，彼此互相派遣職員，充為往來聯絡之任；
- b. 為期軍事行動及輸運補充之敏活確實起見，陸海運輸通信諸事宜，須彼此共謀利便；
- c. 關於修造艦艇兵器及軍事機具等並其所需材料，應量力互相輔助，其軍需亦同；
- d. 關於直接作戰上之軍事技術人員，中日兩國海軍如有互相輔助的必要時，經一方之請求，應由他方輔助之，以資運用。

四、中日兩國海軍於必要時之地點，各自設置諜報機關，又互相交換行動上所要之水路圖誌及情報。

五、本協定及附屬本協定之詳細事項，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軍事之祕密事項辦理。

#### 關於陸軍方面主要的條文：

一、中日兩國各派遣其軍之一部，對於後貝加爾州及黑龍江，各取軍事行動，其任務在救援捷克斯拉夫軍，並排除德奧兩國及為之援助之勢力。

期指揮之統一及協同圓滿起見，行動於該方面之中國軍隊，應入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

二、關於兵器及軍需品之供給，雖緊急不得已之物品，可由前方司令互相協定，然其他物品及原料之供給，則應由東京及北京最高補給機關互相交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涉行之。

三、關於衛生業務，中國如有所希望，日本應於力所能及之範圍內，提供便利，將來情況進展，則關於病院及休養所之施設等，日本亦須受中國之助力。

四、兵器及其他軍需材料並原料之供給及兩國運輸軍隊，各應擔任之輸送等費用，均須給價，應隨時或軍事終了後核算給之。

這個協定，在表面上好像是以「平等地位」訂立的；但實際上却無異於承認日本得以軍事控制中國。因為中國的「海軍」事實上不能開到日本去，而日本的海軍不但可以在「共同防敵」的美名下，隨意開到中國來，而且還要得到「親善」的待遇。中國所供給日本的是當砲灰的無辜的生命和豐富的資源，（連運輸費都要由中國支給）而日本所一幫助「中國的却

是把中國人趕上屠場的指揮官和教練官。至於「行軍區域」大部分是中國地方，更不必說了。

賣國誤國的北洋軍閥政府，當「協定」簽字後，即依照日本的指示，組織參戰軍（後改為邊防軍），軍火完全由日本供給，（後來日本就利用這些參戰軍作為「以華制華」的利器，造成直皖軍閥的大混戰）。假如當時歐戰結束得遲一點，蘇聯的紅軍抵抗力弱一點，中國大眾始終不起來反抗，皖系軍閥的勢力不在內戰中消滅，那麼，日本可以乘戰勝的餘威，藉在中國已造成了的有利條件，完全控制中國，是毫無疑問的。

〔共同防共  
會得到怎樣  
的結果？〕

這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不料在舊傷痕沒有好，新傷痕還繼續增加的時候，竟有那麼一個「中國人」（？）自動

提議再來一次「協調」，而日本却錯認中國人個個都是那麼混蛋，竟敢以「共同防共」的毒計，要中國上當。這「共同防共」的原則要比「共同防敵」進步多了。「防敵」還只限於對外，而「防共」却可以兼而「幫助」中國安內。我們試想，假如中國同意了這原則，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第一，日本必根據這原則，要求中國與蘇聯絕交，陷中國國際地位於孤立。萬一日本進攻蘇聯的戰爭爆發，則日本必驅使中國人做肉彈，霸佔中國的軍事資源，以中國領土為軍事根據地。同時，我們不難想像，在這戰爭中假如日本戰勝（可能性極少），則必進而滅亡中國，假如蘇聯戰勝，則違背民意幫助敵人攻打友人的政府必為人民所懲罰。

第二，日本必根據這原則要求中國允許直接出兵幫助中國剿共，使中

國的和平統一永無實現的希望，使日本軍隊可以進佔中國的任何地域。去年（一九三六年）五月，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訂立中日華北防共協定，日本即繼續增兵華北數達三萬以上，事實上，日本早已藉這一紙「防共協定」，不廢一粒子彈便把平津佔據了。

因為「共同防共」是這麼一個毒辣的，企圖「不戰而屈人國」的陰謀，所以中國人民就不能不堅決反對！

我們不能自尋死路 中國的陰謀，是要佔中國的便宜。中國呢？無論從那方面看——從過去歷史的教訓來看也好，從目前日本的陰謀和眼前鮮紅的血跡來看也好，從民族利益打算也好，從政府本身利害打算也好，中國與日本

在軍事上（無論採取怎樣的形式）都沒有「提攜」的必要和可能，要提攜就只有自尋死路！

雖則到現在止，日本還沒有放棄廣田三原則，沒有放棄「共同防共」的要求；但我們政府對此已明白的予以拒絕；在三中全會宣言中，政府已聲明決定「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前進了，換句話說，政府已表示不願參加國際的侵略集團，與侵略者訂結自尋死路的軍事協定，而願參加國際和平陣線了，這是政府極大的進步，是值得我們擁護和值得迅速促其實現的！

#### （四）從外交上觀察

強國

無國

當去年底中日「外交談判」宣告「暫時」停頓的時候，

東京讀賣新聞曾用「強國無外交」的大字標題報導這段消息，以表示對川越外交「失態」的憤慨。這樣的說法，驟看起來，似乎有點過於誇張；但事實上，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即使不是「無外交」，最少也是外交居於次要的地位。在別的「強國」，說到對外，大都以外交爲前驅，以軍事爲後盾；但在日本，則軍事高於一切。假如要用時髦的話來說，則日本可以說是「七分軍事，三分外交」的國家了，日本評論家清澤冽也說：「日本最被輕視的分野是外交」，這話決非偶然。

日本爲什麼不重視外交呢？這與日本的政治機構和在「九一八」後急進勢力的抬頭，有着密切的關係。誰都知道，日本軍部在日本政治機構中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有着特殊的地位，而自「九一八」以後，急進勢力愈益抬頭，霞關的先生們也就更加不被重視了。

日本外交活躍的時期

當然，日本的外交，也有過活躍的時候；但那樣的時候，大抵是在軍事準備尚未充分或者是在軍事侵略行不通的時候。比方，幣原喜重郎是日本近代最出色的外交家，他先後曾做過五次外相，只要提起「幣原外交」，至今猶爲日本的元老重臣和金融資本家所讚美。但是，這位出色的外交家最活躍的時候，也不過是在「九一八」以前，當軍事侵略的準備尚未充分的時候，在那時他的「和平協調主義」才能大出風頭，他的「經濟提攜」，「日支親善」和「共存共榮」才能喊得滿天響；但一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他這一套「和平協調」的把戲，馬

上就被日本軍閥的馬靴「斷然」地「一蹴」掉了。

軍事時期

日本

無須外交

塘沽停戰協定簽字時止，是日本對中國採取露骨的武裝侵略時期，在這個時期裏，日本是不講什麼外交的。當時日本的外交官員只是替日本的軍閥向世界播送些掩耳盜鈴的欺騙宣傳，向國聯辯護辯護說「日本沒有領土野心」而已。那時候，日本標榜的是「焦土外交」，這個「外交」口號，雖則由內田康哉外相的口中喊出來，但事實上這不過是替日本「皇軍」吹的進軍喇叭吧了。

武裝侵略招來的結果

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後，日本武裝侵略中國的收穫已經非常豐富，但隨之而來的却是日本國際地位的日益孤立，

財政危機的日益深刻，中國民衆反日情緒和日本民衆反戰情緒的日益高漲，使日本軍閥不能不有所顧慮了。於是日本的外交又重新開始活躍起來。軍閥們在不得已的情勢下只得把內田趕走，另請廣田出來播送「迴避戰爭」「萬邦協和」的並不新奇的老調，來緩和對英美的矛盾，減輕對蘇聯的嚴重性；同時又可以使中國一部分「高等華人」鬆一口氣。假使那時中國能洞悉日本的弱點，採取比較強硬的政策，也決不致向日本繼續斷送那麼多的民族利益！正因為中國太不爭氣，所以才使侵略者在「協和外交」的烟幕彈下又毫不費力地向中國攫取了無數的利益，才使侵略者竟敢得寸進尺地向我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一廣田三原則，到後來甚至又向政府提出七大要求。但這次竟華因為全國民衆的反抗，因為政府接受民衆的意見，

才使侵略者的要求無法實現，才破天荒的造成了川越外交「失態」的奇蹟！

佐藤弄  
什麼花樣？

在廣田外交完全碰壁以後，侵略者馬上又變換花樣了，而且這一次花樣，似乎比以前歷次都要來得巧妙。以前，侵略者雖也說過「和平」「親善」，但還未曾說過要以「平等地位」對待我們，而今次日本新外相佐藤居然要說：「完全獨立國家間之交涉，應以平等地位為根據」，並且還說：「過去一切應付東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這位五年前曾在國聯大會上盡量歪曲事實，主張以不平等待我們的佐藤先生，為什麼這回畢竟這樣客氣呢？

「其實，折穿了西洋鏡，一點也不奇怪：第一，五年六個月來，中國所受的

教訓雖多；但侵略者所受的教訓也同樣多，牠知道虛張聲勢，極易招來意外的抵抗，避名求實，乃是最好的侵略方式；第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日本所最痛恨的事（在「抗日第一」的旗幟下，全國大團結）已經着着實現，這時候當然不敢用直率的手段，而只能在「平等互惠」的煙幕下，用陰謀手段使中國分化；第三，日德協定的成立，不但不能解日本國際孤立之圍，反而更加促進了英美法蘇的聯系，增加了日本武裝吞併中國的困難；第四，日本國內民衆對軍閥執行冒險的政策，已經不滿日甚，林內閣爲了緩和這種不滿的情緒，不能不先放幾個烟幕彈作爲「越境」之前的「應有佈置」。（這是筆者在兩個多月前發表在自修大學一輯五號上的對佐藤外交的分析，到現在看來還不算錯）。

除了這四點以外，那就是希特拉先生「褐色指導精神」對日本的影響，加強了佐藤外交「親善」的姿態。

歲月蹉跎，這「日德集體創作」的「平等外交」，由佐藤外相第一次宣布（三月八日）到現在，又快要三個月了。

除了兒玉謙次領導的經濟考察團在中國一度活躍之外，似乎還沒有很大的進展。其所以不能進展的原因，一面固由於日本軍閥對華政策根本沒有改變，所以對佐藤的「過分」宣揚「平等互惠」實在聽不慣，處處要予以掣肘；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已不像從前那麼容易上當了。五月六日佐藤外相接見外國記者，當我國記者問及「外相在議會中說要以平等互惠為根據與中國進行談判一層，是否認為在最近的將來有將所言演成事實的機會」的時候，佐藤居然以極端悲觀的口吻答覆：「在我個人方面，將設法尋求種類此的機會，但恐怕目前無機可乘吧了」；又說，「立時解決存在於華

北的政治問題，殊感棘手」！爲什麼會「無機可乘」？爲什麼會「殊感棘手」呢？由這幾句話，已經完全暴露了「平等外交」的矛盾了。原來所謂平等外交，是一面滿口「平等」，一面又不能放棄廣田三原則。假如中國仍然是過去的中國，當然沒有問題；可是中國現在已充滿了這樣的呼聲：「你們弄錯了，我們並不需要你們改變手段，你們用硬的手段，我們固要抵抗，你們用軟的手段，我們同樣要抵抗，因爲滅亡中國的廣田三原則，我們根本不需要」！於是，佐藤先生便「殊感棘手」，「無機可乘」了。

日本的「外交」的「審察態」畢露的：牠現在退既不願，進又不通，也許有人以爲我這話說得太過火吧？那麼，請等一下，讓我告訴你：日本帝國主義「退既

不願」不單是面子的問題，而且事實上使牠不能後退，因為牠要是後退一步，不但要遠落在別人之後，而且無異宣告自己的破產，那麼，一味「硬幹」，一味前進好了，為什麼「進又不通」呢？因為要硬幹，要前進，無疑會促使中國立刻起來抗戰，試問日本帝國主義目前有這種膽量沒有？我敢斷定牠沒有！第一，日本資本家不願過早發動大規模戰爭，那是在上面說過的；第二，日本民衆反戰反法情緒的高漲，那也是在上面說過的；第三，中國不像過去的中國，中國各黨各派已經開始團結，這是日本最害怕的；第四，中國不是孤立的中國，英美法蘇<sup>都</sup>可以成為中國抗敵的友軍，這個和平陣線的力量無論如何，要比侵略陣線來得大，這也是日本所害怕的。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要硬幹，就只有把三島作孤注之一擲了。

我們不能因此而過於樂觀；我們不能以爲日本帝國主義有那麼多的困難，就會從此軟弱下去！事實上，決不會這樣的！牠仍然要硬幹，不過牠現在正在找幫手，正在使用陰謀。找誰做幫手？大英帝國！因爲日本覺得希特拉和莫索里尼的力量太不夠了，非另找新幫手不可。使用什麼陰謀？拉攏英國，就是一種陰謀。因爲日本看得很明白，中國政府所以能較前強硬，雖由許多因素所促成，但英國對中國政府的撐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日本要壓服中國，拉攏英國，離間英國和中國的關係，是再聰明不過的辦法了。

英國會不會受日本拉攏呢？英國紳士是素來動搖的，不會受日本拉攏？久以前，羅斯爵士還曾兩次到東京去求愛，那時日本的氣氛

正盛，索價非常高，使得士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倫敦三島去；英國紳士受了這一次教訓後，才漸漸改變牠的遠東政策，才決意支持中國政府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政策。但是，英國紳士這種「轉變」，是否靠得住呢？會不會有別的作用呢？當時我國卓越的國際評論家伏生先生，爲了警告國人，爲了促使英國注意，曾寫了一篇「英國在幹什麼」？在那篇文章裏，引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內容如下：

「我們的故鄉一個小村莊裏，有一個土豪，像狼一般地貪婪；有一個劣紳，像狐狸一般地狡猾；又有一個農夫，像綿羊一般地懦怯。

這農夫一向就被土豪剝削欺侮着。農夫家裏的田地都給霸佔了，倉庫裏的麥子，也都賣掉，還了土豪的租了。所剩下的唯一家產，只是兩頭瘦牛和一匹老

馬。有一天，這農夫的牛踏壞了土豪田裏的一根草，於是這土豪就向農夫提出了要求條件，要教農夫把剩下的兩頭牛一匹馬，全送到土豪家裏，作為賠款，不然就得送官究辦。農夫原來最怕喫官司的，這一威嚇還了得。論理他只有服服貼貼地接受這些條件。但在這時候，那位劣紳到了農夫的家裏，就向農夫說：『不要怕，有我呢！』農夫知道紳士先生是和縣長打交道的，就膽大起來。不但沒有接受土豪提出的條件，而且還和土豪家裏的差人，相罵一場。土豪想不到農夫居然敢違抗，倒不好馬上就送官。於是那農夫就得意洋洋地說：『打耳光，陪笑臉，咱老子這回不幹了！』

但是結果怎樣呢？土豪和劣紳講好了妥協的條件，土豪牽去了那兩頭瘦牛，劣紳牽去了那一匹老馬。農夫還得向劣紳另行送上一份謝禮，回到家裏，却已經什麼都不剩了！

伏生先生說明：「這是一個比喻。土豪比方那一國，讀者心裏都會明白，用不到再解釋。農夫自然是指倒霉的中國了。但是那位劣紳呢，我的意思却不一定是指着英國，至少我並沒有這樣希望着」。是的，我和伏生先生一樣，並不希望英國做那位劣紳，尤其不希望我們農夫的兩頭瘦牛和一匹老馬都給他們牽了去，但這却是值得我們十二分警戒的。

不幸得很，土豪和我們所不希望他做劣紳的劣紳，目前正在「講妥協條件」了。結果條件能講得好或講不好，目前還很難斷定，因為他們能否把兩頭瘦牛和一匹老馬分贓得平是一個問題，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條件，（如開放殖民地市場問題等）能否通通講好，又是一個問題。但是，假如他們真的妥協成功了，那中國就真的倒霉了。

中國應該怎樣對付？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對付呢？我還是引用伏生先生的話，雖則這些話是在七個多月前說的。

「我們爲保障領土主權抵抗外來侵略起見，固然不反對任何外國的援助，但是却不可不注重外交的自主。在目前這危急的關頭，正確的自主外交，是只有以中國爲主體聯合一切反侵略的國家，建立遠東的集體安全制度。我們固然要聯絡英國，但是我們尤其要聯絡美國和蘇聯，因爲美國和蘇聯在目前都是遠東反侵略的主要力量。反之，我們要是仍然倚賴某一強國的撐腰，採取以夷制夷的方式，便不免自暴自棄，俯仰隨人，到最後必然變成了強國外交的犧牲品，和上面說起的那可憐的農夫得到一樣結局。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是我們目前所萬萬不可忽略的啊！」

我們一方面要提防不要弄成「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要眼巴巴望着人

家講條件，自己却等待着做那可憐的農夫；他方面，我們更應該明白敵人在弄着什麼陰謀，牠一面雖在唱「平等」「親善」，而另一面却正在準備進一步宰割我們！

「和平親善」？請我們的一部分同胞不要再做這個夢吧！

### (五) 從經濟上觀察

一個有力  
的意見

『任何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在不損我主權與領土原則之下，與我國合作，均所歡迎，惟「搶的不談，要的的合作」，此種出賣國家利益之亡國合作，我人絕對不能接受，中日兩國之經濟提攜，必須先將政治上障礙排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除，方得實現，在冀東察北及走私多項問題未解決之前，中日經濟合作，實無從談起，本人願為全國國民告者，兩國在力量平等之下，始能合作，我人之欲與人合作，務須先有抗戰之決心與力量——立法院院長孫科談話（一、二二中央社）。

這是我國政府要人中，初次對「中日經濟提攜」發表反對意見，這無疑是非常正確而且有力的意見。

痛心

但是，痛心得很，這種「捨的不談，要的合作」的勾當，

事的

到現在還由兩方有力分子在積極推行中。其所以能夠繼續不斷地推進，一方面固由於目前日本國內和國際情勢陷於空前的困難，不能

不藉經濟提攜為利誘，以緩和中國民眾的抗敵情緒，以準備進一步的軍事侵略；但在另一方面，中國一部分有力分子，始終存有幻想，也不能不說

是一個主要的原因。這些人不是本着本身的利害關係，希望從經濟提攜來調整國交，使他們的利益不受威脅，就是認為中國可以用經濟利益來緩和日本的軍事侵略，使中國有喘息的餘地。

荒 唐 的 理 論

這些存有幻想的人，在兩年前，當日本還沒有向我們提議「經濟提攜」的時候，即會以「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或見爲過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給，或適爲中國所需要」（徐道鄰先生語）的理論來向日本「勸誘」了；在「提攜」了兩年後的今日，仍然要說「日本之所長，或即中國之所短，日本所有餘，或即中國所不足」（三月十七日大公報社論）。

我們試來檢討這種「立論」是否正確？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首先，說「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或見爲過剩……」的人應該明白：除非我們承認中國永遠做日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才能如此。因爲「日本之所缺乏」無疑是大批的原料，而「中國之所需要」，當然（？）是大量的工業品了？好吧，中國永遠供給日本原料，日本永遠供給中國工業品，如此「相成相濟，以通有無」（大公報），中國想不做日本的殖民地又怎能辦得到呢？我們現在姑且把這三尺孩童都能明白的理論不談，我們看看事實如何？

根據事實的分析 在兩年前，就有人根據事實，根據精密的統計，證明：日本所需要的商品，十分之八九也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日本底主要輸出品，一部分就是中國底主要輸出品，而別一部分是中國底主

要工業品。比方，日本輸入占第一位的棉花，中國也占輸入第一位；而占日本輸出第二位的生絲，中國在一九三二——三三兩年中，本來占輸出第一位；是近來海外市場被日絲侵奪了，才落到第六位的。占日本輸出第一位的棉織品和第三位底人造絲織品，目下都已經在中國市場給中國機織業以致命的打擊」。（新中華三卷五期）。這是兩年前的情形，兩年後的現在，又怎樣呢？請看下表：

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二月間日本主要輸出入品的情形是這樣：（單位  
日金千圓）

| 輸入品 | 輸出品     |
|-----|---------|
| 棉花  | 八五〇、四五二 |
|     | 綿織品     |
|     | 四八三、五九一 |

|      |         |        |         |
|------|---------|--------|---------|
| 羊毛   | 二〇〇、八九八 | 生絲     | 三九二、九〇九 |
| 石油   | 一八二、七六九 | 人造絲織品  | 一四九、一七〇 |
| 肥料   | 一〇五、〇五七 | 機器     | 八二、〇五四  |
| 機器   | 九一、一八四  | 鐵      | 七六、四〇二  |
| 豆類   | 八二、六〇一  | 罐頭及食品  | 七一、〇七七  |
| 廢鐵舊鐵 | 八〇、八六六  | 絲織品    | 六八、〇二七  |
| 橡皮   | 七二、九五七  | 針織品    | 四九、九八八  |
| 化學產品 | 六一、一七四  | 車輛及其零件 | 四八、八七一  |
| 紙、人絹 | 六七、一〇七  | 毛織品    | 四五、九五六  |
| 木材   | 五五、五四八  | 陶磁器    | 四三、一九二  |
| 鋼材   | 五三、二五八  | 鐵器     | 四〇、三〇二  |

煤

五〇、八八七 玩具

三六、四五九

同期中國主要輸出入品的情形又是這樣：（單位國幣千元）

輸入品

輸出品

|       |             |      |            |
|-------|-------------|------|------------|
| 鋼鐵及其他 | 一〇八、〇三三、五二六 | 桐油   | 七三、三七八、六五四 |
| 機器及工具 | 五八、三五八、一〇九  | 蛋及產品 | 四一、八〇二、〇一三 |
| 車輛船艇  | 五一、四一〇、五九二  | 生熟皮貨 | 三九、二〇一、六五二 |
| 化學產品  | 五一、九〇二、五八三  | 生絲   | 三六、七一二、八九〇 |
| 雜類金屬品 | 四六、七三一、一二六  | 花邊   | 三一、三八三、六〇一 |
| 染料顏料  | 四一、一五一、四〇九  | 茶葉   | 三〇、六六一、七一  |
| 煤油    | 三九、七五二、三六四  | 棉花   | 二八、一九七、七一九 |
| 紙     | 三八、三三五、九五四  | 錫錠塊  | 二六、七六八、九三四 |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七五

棉花

三六、一八〇、七九三

豬鬃

二五、三〇三、七四六

木材

二八、九六八、七七五

羊毛

二〇、〇二三、四六八

米

二六、八七〇、六五九

芝麻

一八、五六〇、四三八

汽油

二三、七一三、〇一二

雜糧

一八、一一六、三二四

糖

二〇、四九三、九三一

礦砂

一五、四三七、五四六

.....

綢緞

一二、九九八、二四九

我們把上面兩個表加以分析，就會明白：我們所最需要的東西，日本不但不能供給，而且是牠自己所需要的；而日本的主要輸出品，一部分仍然是中國的主要輸出品，另一部分也是中國工業的生產品。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或見爲過剩；反之，日本所能供給，或適爲中國所需要」的理論，實在未免過於荒唐了。

日本要掠奪

的和給我們

日本要和我們「提攜」，主要是要得到下面的東西：

一、我們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棉花；

二、我們自己也逐漸需要的煤和鐵；

三、我們自己不夠供給的糧食；

四、其他。

日本要和我們「提攜」，主要是要供給我們下面的東西：

一、我們自己也生產的棉布；

二、略略加工的蹩腳的鋼鐵和機器（原料仍出自中國）；

三、不耐用的化學製品和玩具；

中日兩國在現階段能不能做朋友？

#### 四、其他。

此外，日本的野心還大哩！牠因爲沒有錢向中國投資，却要求中國政府整理舊債，即整理中國民衆所絕對不能承認的「西原借款」，牠想拿這些錢做老本轉來荼毒中國人；還有，牠想完全霸佔中國的有軍事意義的航空線、鐵路、港灣、礦山和製鐵業；還有，牠想完全打倒中國的民族工業，完全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總之，日本是想中國完全變爲牠的殖民地！

中日經濟  
濟提攜  
的成績

日本帝國主義不只「想」就了事，而且自從提倡「中日經濟提攜」兩年以來，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呢。

在貿易方面，日貨的進口源源增加，由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一一·三

九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一六·九一，私貨的進口，尤爲驚人，據估計，日私貨的侵入已超過三億元以上。所以結果使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正規商業已經遭受了並且繼續遭受着嚴重的摧殘和打擊；在工業方面，日本把我們重工業的原料「強刦」以去，把我們的輕工業幾乎完全打倒；在金融方面，日本盡量盡着破壞的作用，把中國的現銀大批私運出口，連我們的海關職員也打得頭破血流！

以上還是就全國方面一般的情形而論，若說到華北的情形，就更加慘痛了。關於這，駱耕漠先生著的中日經濟提攜（黑白叢書之二）已經說得相當詳細，讀者可以參考，這裏不必重複多說了。

我們根據事實的分析和兩年多來的慘痛經驗，已經明白：在國民經濟

的本質上，中日間的利害絕無調和的可能；假如我們明知利害而仍甘心上當，則只有使中國加速殖民地化，只有使中國國民經濟迅速完全破滅而已！

## (六) 從文化上觀察

不要  
做  
傻  
瓜

一個知識落後的人，虛心地去接受進步人的知識，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批判地去吸收先進國家的文化，不但是必要，而且是急需的。中國是文化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而日本是有相當高度文化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有些地方要學習日本，批判地吸收日本文化

的精華，那是誰都不能反對的。但是，假如你咬住這個原則，不問事實的真相，認為「中日文化提攜」也「不但是必要而且是急需的」，那麼，你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我們必須認識，批判地去吸收別人的文化的精華和奴顏婢膝地去接受別人的文化的侵略，那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爲要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大衆永遠做牠們的奴隸，牠們決不希望奴隸們真的能吸收牠們文化的精華，牠們只希望奴隸們永遠愚蠢、麻木和墮落。所以當牠們侵略殖民地的時候，牠們不單是要進行軍事、政治、經濟的侵略，牠們並且還要進行文化的侵略。更具體的說，牠們不單是要用大砲毒瓦斯來屠殺殖民地大衆，強迫他們訂立賣身契，和控制他們經濟的命脈，而且還要拿白蘭

地、鴉片煙和聖經來麻醉殖民地大眾的頭腦，使他們懂得「打你的左頰，予以右頰」！自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不能例外。日本對中國軍事、政治和經濟的侵略已有相當效果了。文化呢？也正在「提攜」中！

日本拿什麼  
「文化」來  
侵略中國？

我們要知道中日「文化提攜」的內容，必要首先了解日本侵略中國的文化政策。

日本雖說是「先進」的國家；但是牠的東西都是從別人學習而來的，牠在「明治維新」以前是學習中國，明治維新以後，則是學習西歐。那麼，牠現在要用文化侵略中國，究竟拿什麼東西來侵略呢？妙得很，牠主要的不是拿西歐的東西，而是拿由中國學去的東西，「送回」給中國！

a. 佛教——佛教本來最初是由印度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入日本的；

可是日本現在却要以佛教來侵略中國。說起這件事，曾經有過一段笑話：歐戰時，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當中有一條是「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當時中國的士大夫看到了差不多要笑脫牙齒，他們認為日本的宗教都是由中國輸入的，牠有什麼「教」可以向中國「布」呢？當時外交次長曹汝霖的說帖中也說：「所謂教者，未聲明何教，不知所指，大抵爲佛教也。佛教來自天竺，至中國後，乃傳入日本，焉有由日本布入中國之理？」其實，我們只要冷靜的想一想，就不難知道日本的毒計。牠是要利用「布教」的名義，在中國內地到處建立寺院，組織佛教團體，偵察中國的消息；牠是要拿佛教的信條，磨滅中國人的愛國知識，使

中國人忘記了亡國的慘痛，使他們「今生」多吃苦，等到「來生」再來享受幸福！

b. 孔教——尤其妙不可言的是日本以尊孔來向我們號召，在東京大建孔子廟，迎接「大成至聖孔子先師」的第幾十代賢孫到東京去，鄭孝胥也用了孔子「夷狄之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的道理，來說明中國應該受日本的統治。為什麼日本要向我們「班門弄斧」呢？關於這問題陳伯達先生曾有精闢的解釋：

『有人說：孔子是中國人，「尊孔」就是在提倡中國的民族意識。其實這話是太滑稽的。某民族的一種學說，一種哲學，一種宗教，如果是適合於使人安分守己，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同時也仍可由異民族用為壓迫自己民族的工具。

這種例子本來是很多的。孔夫子都會被蒙古人和滿洲人用來統治過中國的，這在我們，是還「記憶猶新」的。耶穌是基督教的創造者，但他是猶太人。當基督教由奴隸的宗教變成奴隸主人的宗教以後，即使是那絕端瘋狂反對猶太人的現代希特拉黨徒，却也是還要基督教。

我們中國舊時的帝王，不但曾經用孔教統治過我們中國人民，同時也用過孔教來統治我們的藩邦。當現代帝國主義者，從中國手里，掠奪去了這些藩邦以後，他們雖則騙去了中國的勢力，但却保護了孔教，而且還進一步地提倡了孔教。如朝鮮，如安南這都算是彰明較著的。如果孔教可以激發民族意識的發展，各帝國主義者當然是不會做這些傻事的。恰恰相反，他們的提倡孔教，正是爲要抑止那裏民族意識的發展。

孔子的哲學，無疑地，是統治者的哲學，是服從的哲學，是愚民的哲學。孔

子最厭惡「反抗」（犯上），最厭惡民智的開通。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成現代語，就是：「老百姓可以拿來供驅使，但不可給他們有知識」。在這一點上，就可以說明：為什麼現在我們的侵略者和漢奸們特別的歡迎着他。』（新世紀一卷二期論新啟蒙運動）。

佛教和孔教是日本拿來麻醉中國民衆的主要工具，此外，基督教、自然科學、醫學、技術等等，牠都會善於利用的。

文化提攜

「中日文化提攜」本來是在兩年前倡議「中日經濟提攜」的實情時一並提出來的。當時日本外務省爲了「謀由中日兩國從文化方面，實現國民提攜，以爲中日提攜具體策之一助」起見，曾向大藏省（財政部）提出「對華文化事業特別制度改正案」，這案是以現行規定爲

基礎，將每年三百萬元的固定經費，從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起增加百萬元，以「強化文化工作」。當時曾派遣文化事業部第一課長林安視察中國，偽「滿」等各地實情，並草定「文化提攜」的具體案，這案的內容大概如下：

1. 北平的人文科學，上海的自然科學研究所等，雖為學術的協力，然有失於高深之嫌，須考慮直接的國民文化協力的方法；
2. 中國各方面均有「獨特的病疫」，一如長江沿岸的風土病，醫療方法尚未發達，須考慮日本醫學向這些方面活動，如同仁醫院的擴張和補助方法等，須設法直接踏進中國民的生活裏面去；
3. 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最近有激增的傾向，須設法「優待」並

### 「獎勵」其留學；

4. 為謀「技術」的協力起見，須派遣技師，積極斡旋。

很明顯，從這具體方案的第一條看，日本的「文化工作」，不但着眼在知識分子，而且還要惠及平民了。從第二條看，日本是企圖戴起「慈善」的面具，侵入中國長江流域等腹地，來理治中國「獨特的病疫」。從第三條看，日本要製造許多「知日派」（日本人稱中國的親日派為「知日派」），替牠効忠。最後，牠還要用「技術合作」的美名，來操縱中國軍事、政治、經濟的實權。

兩年來的成績怎樣呢？

文化 提 摺 成 績

北平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和「人文科學研究所」

等本來在民國十四年就已成立的了。去年爲了加緊「宣揚東方文化」，曾大加整理和刷新並添設近代科學圖書館；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除予以同情協贊外，並訂購「四部備要」各書二千四百餘冊贈予該館。在兩方熱心「提攜」和「宣揚」之下，郭沫若的「沫若文集」在北平也被禁售了。原因是該書會涉及中國古聖賢孟軻離婚和孔夫子吃饭的問題，有侮慢孔孟之嫌！

上海的「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是於去年十二月成立的。這圖書館的館址是在上海四川路福州路轉角宏業大樓的底層。共有六間房子，陳設精緻，日文報紙雜誌特別是兒童畫報等相當多，招待也極「親善」；但是中國人經常在裏面看書的却並不多，這我可不懂得是什麼道理了。

在日本對留學生的「優待」和「獎勵」之下，兩年來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學生大大的增多了，據說，最近已超過了六七千人。日本到底對這些留學生怎樣「優待」呢？你若是對日本「親善」的，你若是經常跑咖啡店和跳舞廳的，那麼，當然可以另眼相看；反之，你若是真真用功的，或者你是要讀進步書籍的，那麼，你的腦袋就要捱打。前兩個月，就有大批的留學生被打穿了腦袋趕回來！其次，日本對待留學生最毒辣的手段是用陰謀促成「各黨各派」的對立和互鬥，前幾個月，「留日同學會」的朋友們就是受了日本人的鼓動，將「學聯會」的朋友們打得頭破血流！

以上是對待知識分子的「文化提攜」，但日本認為這未免「偏重學術

方面，和中國民衆接觸的機會太少，因此未獲得充分效果」。爲補救計，特於去年五月在天津濟南設立「產業研究所」，「對於政府開發華北經濟的政策，予以側面的幫助」！去年十二月又在天津設立「第一農場試驗場」，並擬在灤縣和冀北設立第二和第三場。在岐口則積極進行設立大規模的捕漁場……總之，日本是藉「技術合作」之名，而行無微不至的侵略之實！

但是，日本還不以這樣的「提攜」爲滿足，牠還要用武力威嚇那些患「恐日病」的人，要他們執行修改教科書的使命，把那些有關於抗日排日，喚起中國人民族意識的一字一句，都予以「根絕」。牠想用這樣野蠻的方法一下子把中國人子子孫孫的民族意識完全消滅！

試問：這樣的「文化提攜」我們能夠容忍嗎？

## 二 中日兩國有暫時親善的可能嗎？

中國不應至死不悟！

在上面，我們從歷史、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都扼要地加以觀察，已經客觀地指出：除非中國甘心做日本的奴隸，中日兩國在現階段根本沒有親善的可能。這個由事實所得的結論，不，這個由慘痛的教訓所得的認識，每個中國人早就應該把握到的了。因為中國受日本的壓迫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而是已經有六十多年

中日兩國有暫時親善的可能嗎？

慘痛的歷史了。在五年前，陳振先先生替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作序的時候，就曾經這樣警告過我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知將來，可觀既往，人有其舅死於虎，不久其夫又死焉，不久其子又死焉，而猶望此虎今後之或慈於我而不爲之備也，斯真至死不悟者也！」

至死不悟

大有悟

是不幸得很，這樣「望此虎今後或慈於我」的人，還多得很！這些人所以如此糊塗，並不是因爲他們不知道那隻「虎」的貪得無厭，而是因爲他們過分的害怕那隻「虎」。他們把敵人的力量過分的誇大，把自己的力量過分的看得渺小，他們真的把敵人當作猛虎，而把自己當作綿羊或蝦蟆。兩年前我讀過一篇叫做對日的兩條路線的

文章，裏面就有這樣的話：「今日的中國，正是一隻羊，到處是虎，還想偷生嗎？」又說：「中國今日真真正正的還只是一只蝦蟆」！因為該文作者認為中國是一隻羊，一隻蝦蟆，所以強調地說中國不能抵抗，抵抗便是「一條求死的路」（大意如此）。

不抵抗又怎樣辦呢？該文作者指出另一條路：

「認定目前的形勢，東北四省決非武力所可收復，如此則惟有照×  
×屢電所說的，確立一個最低限度，所謂最低限度，即決心不承認偽  
滿，在最低限度之內，可以忍讓，可以委曲求全，逾乎最低限度，則惟  
有決裂，惟有犧牲，寧死不辱」。

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一個辦法呢？據該文作者解釋：

這個辦法有三個作用：

「其一，在一面極力忍讓的時候，一面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去做準備的工作，去做充實國力的工作；……」

其二，以我們中華民族忍讓的態度，犧牲的決心，奮鬥的精神，或者可以感動日本人使之覺悟與中國爲敵，不如與中國爲友，如此庶幾東北四省問題或者可以得到一個和平的解決，以和平的方法達到收復失地的目的。

其三，在一面忍讓一面準備當中，等待國際形勢的推移。……」

事實勝

時光過得真快，自該文發表後，中國事實上又「忍讓」了兩年多了，結果怎樣呢？結果，中國的國難更加嚴重了！

於雄辯

因為，敵人看到你愈「忍讓」，牠就愈要得寸進尺，愈要向你多割幾刀；提出三原則之後，繼續又提出七大要求！由此可以看到「忍讓的態度」，永遠也不能「感動日本人」！「以和平的方法」，永遠也不能「達到收復失地的目的」！

那麼，我們換一個辦法，不採取「忍讓」，而採取「抵抗」的辦法，是不是真的是「一條求死的路」，是不是「不能達到收復失地的目的」呢？事實又與那種估計相反！綏遠局部抗戰的勝利，不但證明抵抗不是「一條求死的路」，而且還證明抵抗可以收復失地！

又一種

自從綏東局部抗戰勝利後，使「中國今日真真正正的還

新學說

只是一只蝦蟆」或「一隻羊」之說失了根據；自從西安事變

和平解決後，更使中國人的自信心大大的增加起來。目前似乎再沒有人說「盡現時全國所有的力量而一戰，已是沒有把握，能否集中全國的力量，更是沒有把握」的話了；但是繼這種畏日如虎論之後，又出現了一種非常樂觀的論調：他們認爲中國的「非常時」已經過去，現在已入「常時」的階段，是安心「建設」的階段了。他們所以如此「樂觀」，一方面認爲中國的地位已經有了非常的改善，所以日本已不能不對我們另眼相看，甚至不能不向我們「伸手求和」了；另方面則認爲日本「軍部與資本家合作之新局面，預料將相當延長，而日本外交之暫趨和平，在其本身利害上，蓋有其必然的需要」。於是，他們「本此觀點」，斷定「中日關係，在現階段下，至少不致再有惡化」，（四·十三大公報社評）

不致再惡化嗎？

這樣的分析，顯然和我們上面的分析相差很遠。自然，

相當的好轉，因而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了相當的改善，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會因此就向我們「伸手求和」，牠至多也不過暫時換一副侵略的面孔，改變一下侵略的手段；我們也不否認，日本「軍部和資本家合作的新局面」，有「相當延長」的可能；但是「中日關係，在現階段下」，不見得就因此「不致再有惡化」；要知道，軍部和資本家的苟合局面，雖然極力排斥「觀念的急進」！但決不致放棄「實踐的急進」！日本第七十屆議會通過空前龐大的預算案，最近日偽軍在綏東的積極活動，日軍在華北的加緊佈置，到底爲的是什麼啊！

中日兩國有暫時親善的可能嗎？

虛偽的暫時  
親善到底於  
誰有利？

那麼，我們是不是說，目前中日戰爭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中日兩國連像日本所希望的虛偽的暫時的「親善」也不可能呢？我的話當然不是這樣簡單的。當敵人在國際地位正陷於非常的孤立，英日談判還沒有得到什麼結果，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準備還沒有十分充分，中國也還沒有立刻收復失地的決心和行動的現在，中日間虛偽的暫時的「親善」還是有可能實現的。不過，這樣的「親善」，要是真能實現，到底吃虧的是誰，我們不難想像！

也許到現在止，還有人認為，只要日本暫時對中國不採取軍事的侵略，中國即使吃一點「小虧」也是值得的，因為這樣中國便可以多做一分準備的工作。

這話驟看起來，好像很有理由；但是只要仔細一想，就會知道這是自欺欺人之談。當然，我們承認，抗敵是需要真正的準備的（怎樣叫真正的準備？下一節再說）；但若果一方面對敵人繼續退讓，另一方面又說如何如何準備，這樣的準備，無疑是有益於敵人的準備。關於這一點，立法院委員張西曼先生說得好：

『現今我們祖國已踏進滅亡的階段。在喪失多數主權領土的事態下而仍憧憬對生死敵人談甚麼片面的「親善」和「邦交調整」，結局必定「割肉飼虎，殘軀不保」！以言枝枝節節的物質準備，就是百年也趕不上敵人「先進」的優勢，更何堪一再坐視它們深入我們堂奧準備了它們所要「準備」的呢！自東三省熱察和綏北大部盟旗的淪亡，國家民族的生命幾日蹙。……

『我們暫時可不談華北和他處的危機，來把「漢賊不兩立」的偏安局勢分析

一下。如果長江流域能够具備民族復興的保障條件的話，自也無妨選擇一個所謂「堪察加」（？）的根據地徐圖恢復。不過我們現在就來作這個妄想，却是忘却殖民地身份的糊塗蟲。毒惡的敵人已經是「無孔不入」。他們不但節節侵吞我們那些要待開發的經濟地帶，就是偏遠些的新疆寧夏等處，也都佈置了嚴密的偵探特務網。他們利用了內河航行，租界和毗連區域駐軍種種的特權，而在上海漢口作種種陣地的布置，更是公開的事實。他們準備在「半壁河山」的咽喉心腹要害制我們的死命，要把我們四肢砍斷，再來結果這神經中樞不健全的頭顱」。（積極救亡和慢性中毒）。

事實確是這樣，說到物質的準備，我們還可以舉例來證明。據軍事家的估計，「中國的兵工廠即使日夜開工，每天也造不出五百枝步槍；但敵人的兵工廠，每天却可以毫不費力的造出七百枝步槍。至於高級一點的器

械，不要說高射砲、轟炸戰鬥機和新式戰車，就拿機關槍來說，在同一時間內，我們的製造能力平均還不及敵人的三十分之一。這就是說，我們準備了一個月，其成績不及敵人一天的準備。器械方面是如此，其他方面（如軍需準備，交通器具等），也莫不如此。這樣，我們的「準備」時間愈久，即我們的實力愈不及敵人，亦即一旦接觸，我們的敗亡必愈快！」

再就綏東的抗戰來說，假如我軍在收復百靈廟大廟子之後，立刻一鼓作氣把多倫察北完全收復，一定毫不費力；但是中國當時却沒有這樣的勇氣，到現在敵人在那方面的準備更加充實了。多倫的飛機場、營房、倉庫、宿舍等，現正在積極擴大建築，多倫至沽源張北一帶，軍運的繁忙，爲以前所少見；日偽軍正在加緊訓練和擴張中，「內蒙古軍」擴編至三師

以上；關東軍司令植田甚至親自出馬，赴熱察視察後，決在察北增駐日軍一旅團，並設「內蒙」司令部……無疑的，假如我們現在要收復多倫察北就必要費更大的力量！假如我們現在還不去收復多倫察北（作為收復失地的第一步），敵人必然很快就要來「收復」我們的百靈廟綏遠以至整個華北了。

總之，在現狀下，我們要苟安，要和敵人談「親善」，利益無疑要落在敵人的手上，毒害無疑要加在我們的身上。這一點，應該是我們每個中國人必有的常識了。

### 三 解決中日問題的關鍵在那裏？

#### 問題的中心

當前中日間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完全把日本請出中國去抑  
日本完全把中國滅亡的問題。要是這一中心問題不能解決，  
則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消滅為止，中日間將永遠有問題。目前解決這問題的  
關鍵在那裏呢？

我們常常聽到一些人說：「中日問題的關鍵在日本，只要日本放棄對

解決中日問題的關鍵在那裏？」

關　　鍵  
那　　在  
裏

中國的侵略，中日問題便可以解決了」。這話若果站在外交家的立場說，當然「無可厚非」，因為他是在說官話。這話若是出自普通人之口，那麼，對不起，我們只能這樣不客氣的對他說，「你只想取消問題，或者希望日本帝國主義者可憐你，而並沒有指出問題關鍵的所在」！因為事實告訴我們，除非我們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除非我們用鐵和血把日本的大陸政策完全粉碎，日本是不會放棄對中國的侵略的！既然日本不會放棄對中國的侵略，既然日本滅亡中國的整個政策是不会變更的，那麼，澈底解決中日問題的關鍵，顯然不日本，而在我們，在我們是否有抗敵的決心和抗敵的真正準備！

不幻想敵人會自動放棄對中國的侵略，不幻想可以用「和平方法」解

決心？

決中日問題，抱定「抗敵則生，降敵則死」的堅決的信念，準

備與敵人一拚，那才說得上有了抗敵的決心。中國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了抗敵的決心呢？三中全會的宣言告訴我們：「即使蒙受損失，超過忍耐之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這表明政府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表明政府已經有了「抗戰」的決心了。不過宣言又說：「假使和平之期望猶未完全斷絕，吾人固仍願確守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之原則下，求其初步之解決，使匪僞失其依附，主權克臻完整，如是則兩國間懸而未決之問題，雖未完全着落，而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之可能，始得露其端倪」。這又很容易使人誤會政府抗戰的決心尙未澈底，誤會政府還存有「和平之期望猶未斷絕」和「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的幻想。這種誤會，我們希望

政府在實踐中使牠消除；同時希望全國同胞起來擁護政府抗戰的決心，使政府真能實現抗戰的諾言！

要實行抗戰，當然要有真正的準備。所謂真正的準備，  
什麼是  
真正的是  
準備？我以為應具備下面諸條件：

第一，要動員全國力量。這個道理是很顯然的。敵人以「舉國一致」的力量以謀我，假如我們不能以全國的力量來對付，則失敗以外無他途。如果說，抗敵救亡，可以委諸幾個上層領袖或二百萬大兵的身上，那也是除了失敗以外，不能有別的希望。因為能真正負責領導救亡的領袖，固然十分需要；但是所謂領袖，原不過是羣衆的領導者的意思，要是只有領袖，而沒有羣衆，沒有全國的力量為後盾，那無論任何萬能的領袖都無法

獨力地負得起這救亡的重任！至於說到二百萬大兵，也不能單獨負起抗敵救亡的任務，因為我們有二百萬大兵，而敵人在戰時却可以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大兵，我們單靠這二百萬大兵，又怎能靠得住呢？如果說，我們的「精神文明」（禮義廉恥之類）可以戰勝敵人的「物質文明」（飛機坦克車之類），那麼，鴉片戰爭以來一切被外國強盜壓迫的慘史不會發生了。老實說，我們有很多的地方都不及敵人，無論是物質文明或精神訓練；我們所能夠戰勝敵人的就在我們有龐大的國力，特別是國力中的人力。因為敵人連台灣朝鮮在內，只有九千萬人口，其中屬於帝國主義陣營的，不過十之一二，而我們則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大半都有抗戰的決心和抗敵的迫切要求的。所以我們要真正抗敵，要有真正抗敵的準備，就只

有動員全國力量，特別是全國的人力。

我們怎樣才能動員全國的力量呢？捨實行民主政治以外無他途！這個道理也是很顯然的。所謂動員全國力量，除人力外還有智力物力和財力。

我們要動員全國的人力，固然非全國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使他們由散砂變爲水門汀不可，我們要動員全國的智力，固然非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使大家能盡量發表意見，討論救亡大計不可；我們就是要動員全國的物力和財力，又何嘗不需要藉言論出版等自由之助，才能使全國人民不問貧富，都踴躍輸將，毀家紓難呢？由此可以明白，動員全國力量是真正備戰的必要條件，而民主政治則是達到動員全國力量的必要手段！

第二，要立刻聯合世界的抗日勢力。我們不能否認，日本是一個強大

的帝國主義國家，並且已經和侵略國家的德意聯成一氣，締結了軍事同盟；而我們却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到今天止，我們還沒有和任何可靠的友邦取得密切的聯繫。如今我們要抗日，要作抗日的真正準備，我們就不但要動員全國的力量，我們還須聯合國際上一切抗日的力量。不過我們要認識清楚，我們要和別的國家聯合，決不是依靠別的國家或執行別的國家的外交政策。比如說，我們要和英國聯合，決不是依靠英國或執行倫敦的外交政策；要和美國聯合，決不是依靠美國或執行華盛頓的外交政策；要和法國聯合，也決不是依靠法國或執行巴黎的外交政策。我們要和一切反日的國家聯合，而不是依靠一切國家和受牠們外交政策的支配，我們是要以獨立自主的立場，和牠們聯合起來，以對付我們共同的敵人！

第三，要對敵人不再作半步的退讓。假如一面空談準備，一面對敵人讓步，就無異取消準備。因為任何微小的退讓，都是對自己有極大的損失，對敵人有極大的幫助的。所以要真正準備抗戰，就不應該和敵人再進行什麼「和平談判」，更不應該在談判中有半步的退讓！

第四，要肅清一切親日的勢力。在今天，親日勢力已成爲抗敵救亡的最大障礙，這是不言而喻的了。只有把這些勢力澈底肅清，抗敵戰爭才能順利進行。

以上四點，是真正準備抗戰必具的起碼條件。只有具備這些條件，才是真的準備，否則便是假的欺人的準備。同時以上四點，是相聯而不可分離的，缺少了一點，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真正的準備，就無法完成抗敵救亡

的任務。

中國有沒  
有真正  
的準備

從第一點來衡量，中國民主政治目前還只是一線的曙

光。這一線曙光將擴展為太陽抑將曇花一現地消滅，就要看

三中全會的決議是否能在國民的督促下逐漸兌現和快要到來的國民大會的情形如何了。三中全會後的實狀如何，是大家明白，我們不必多說；說到國民大會組織法和代表選舉法，過去缺點很多，實在說不上合乎民主的原則，但自從經過中央政治會議修正後（主要是把國府圈定候選人的規定刪去，而增加指定代表二百四十人），却有了若干的進步；這種進步我們國民當然是歡迎的，然而覺得是不夠的，「指定代表」不管如何「公平」，與民主原則總有出入；其他代表選舉法應該修改的地方（如「經公民宣誓

者」的規定，政治犯的沒有選舉權等），很多還沒有修正。我們希望政府還有更妥善的補救辦法，以求合於民主。同時，全國同胞，爲了督促政府動員全國力量，爲了促進抗戰，和爲了自身的利益，對民主權利的獲得，還須努力爭取！

從第二點來衡量，也還在希望中。在三中全會宣言中，雖已提到「其他國際關係，自當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前進」，表明政府已有了和一切和平國家（反侵略國家）聯合的傾向；但到現在爲止，除了和英國比較有密切的關係外，對其他各國，如美國、法國和蘇聯，似乎還沒有進行聯合的切實行動。我們在上面說過，在國際和平陣線中，英國是最容易和侵略國妥協的國家，事實上，牠目前正在和我們的生死敵人進行着「對華合作」談判。

呢。爲了防止我們僅有的「兩頭瘦牛，一匹老馬」不被牠們牽去，不，爲了我們整個民族的解放，我們此刻不能再等待，再取靜觀變化的態度了。

我們現在一方面要嚴防牠們聯合搶刦，一方面須迅速和其他可靠的友邦（如蘇聯）切實聯合起來，增厚我們的力量！

從第三點來衡量，情形還不能樂觀。雖然政府已有不再退讓的表示，這種表示我們當然認爲是政府極大的進步，我們非常歡迎這種進步；但是只要「和平談判」仍然進行，對於我們總是害多利少的，因爲一切中日間談判的本質無他，「不過日方企圖不但保守業經奪得的大幅中國領土，並且進而統制全中國而已」。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這樣的「和平」談判！

從第四點來衡量，情形更不能樂觀了。我們不能諱言，中國到今天所

以還不能實行全國規模的抗戰，親日勢力的阻撓，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我們希望全國同胞，加緊督促政府，實行清毒工作！

雖然許多實際情形不能令我們滿意；但是中國今天的現狀，無論如何要比過去總算好了許多；我們要努力鞏固好的地方，極力促進改善壞的地方！

歸根到底，解決中日問題的關鍵，無疑是系於我們努力的程度如何了。

## 四 中日關係的前途

我們須

要

總清算

我們一開始就說過，中日兩國，決不是自古以來就成爲敵人，中日兩國所以成爲敵人，完全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從中作怪。在過去，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逐漸發展，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的不能發展，結果，日本便漸漸變成了一個侵略者，而中國則漸漸變成了一個被侵略者；跟着，中日兩國也漸漸由友人變爲敵人了。六十年來，中日

間的舊賬實在太多了。到現在，日本在加緊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早已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而中國則在被侵略的過程中，早已降到悲慘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假如我們現在不來一次總清算，假如我們不把現狀改變一下，那麼，中國和日本永遠也不能由敵人再變爲友人！

我們現在須要來一次總清算，我們須要改變現狀，在經過一次總清算，在現狀改變以後，中日間的關係就會完全和現在不同了。怎樣不同呢？

兩種

在上面說過，當前中日間的中心問題，是中國把日本請

前途

出去，抑日本把中國滅亡的問題。因此，在最近的將來，中日關係的前途就只有兩種；一種是光明的前途，那就是經過總清算後，中國站起身來，把日本請出中國去，結果，中華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大和民

族必然也在這種過程中從法西斯政府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於是兩大民族便可以以真正平等的地位緊密地攜起手來，那時候的「中日親善」才算得真的親善，那時候的「中日提攜」才算得真的提攜！另一種前途，是非常悲慘的前途，那就是我們永遠不起來作總清算，或者在總清算中，日本帝國主義將中國完全滅亡，結果，中國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成爲少數人支配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

這兩種前途到底那一種的可能性大呢？

勝利一定落在我們手上而中華民族也就終歸有一天要抬頭的；但是，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我們知道，假如中國對敵人的侵略始終不抵抗，假如我們始終不起

來和敵人來一次總清算，那麼，中國在最近的將來，被日本完全滅亡的前途還是十分可能的。印度的被英國滅亡，朝鮮的被日本滅亡，我們東四省的被日本強佔，便是前車之鑒。不過，我們現在到底和印度，朝鮮的滅亡和東四省被強佔時的情形不同了。現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高漲的時候，現在是中華民族開始抬頭的時候了。我們民衆已經有了抗戰的決心，政府已經開始有抗戰的準備了。我們只要加緊努力，加緊把民族的抗敵陣線鞏固起來，加速發動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則勝利的把握必然要落在我們的手上。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應該把握這個偉大的信念，不斷地努力前進，最後才能達到中華民族解放的目的！